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中 医 历 代 临 床 珍 本 丛 刊

褚氏遺書

原著 〔南齐〕褚 澄

校补 卢祥之 张晋峰 张淑贤 李静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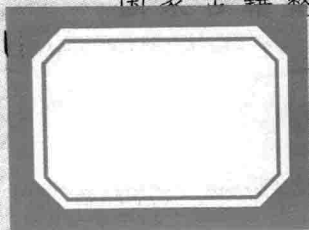
顾问 余瀛鳌 孟庆云



人民軍醫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



中 医 历 代 临 床 珍 本 丛 刊

褚氏遺書

原著 〔南齐〕褚 澄

校补 卢祥之 张晋峰 张淑贤 李静媛

顾问 余瀛鳌 孟庆云



人民軍醫出版社

PEOPLE'S MILITARY MEDICAL PRESS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褚氏遗书 / (南齐) 褚澄原著; 卢祥之等校补. — 北京: 人民军医出版社, 2012.3

(中医历代临床珍本丛刊)

ISBN 978-7-5091-5729-9

I. ①褚… II. ①褚… ②卢… III. ①中国医药学—中国—南齐 IV. ①R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11046 号

总策划: 杨越朝 策划编辑: 任海霞 焦健姿 卢紫晔

文字编辑: 刘婉婷 责任审读: 王三荣

出版发行: 人民军医出版社 经销: 新华书店

通讯地址: 北京市100036信箱188分箱 邮编: 100036

质量反馈电话: (010) 51927290; (010) 51927283

邮购电话: (010) 51927252

策划编辑电话: (010) 51927300—8201

网址: www.pmmp.com.cn

印、装: 京南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2.875 字数: 70千字

版、印次: 2012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2500

定价: 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购买本社图书, 凡有缺、倒、脱页者, 本社负责调换



内 容 提 要



《褚氏遗书》是南齐时阳翟人褚澄传世之作。本书仅有2200余字，但内容丰富，具有真知灼见，“发挥人身中造化之秘，明白要约，殆无余蕴”。《四库提要》评论该书说：“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全书分受形、本气、平脉、精血、津润、分体、余疾、审微、辨书、问子10篇，内容简短，多据《黄帝内经》理论加以阐述发挥，充分体现褚澄及当时卓越医家重视精血、津液的认识与学说。其中对血证及妇科病证治的见解，尤为后世医家所推崇。



五代清泰十一年（大约公元945年），曹州人黄巢起义，天下大乱。唐懿宗以来，因皇室奢侈过度，赋税沉重，加上连年发生水、旱灾，遂致民不聊生，盗匪群起。唐僖宗乾符元年（公元874年），王仙芝率盗匪起事，翌年黄巢起兵响应，乾符五年王仙芝败死于湖北，黄巢被推举为冲天大将军，率众攻掠江、浙、闽、粤等地，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陷洛阳、长安，僖宗逃奔成都，巢自号为帝，国号大齐。

当时乱世，盗贼峰起，据说有个掘墓贼，盗墓时遇到了一个方圆一丈多的大墓穴，中间有18块环石作为棺槨，盖上有6块，上写着“齐褚澄所归”的字样。棺材里的尸体已经被虫蚁腐蠹，然环石的内侧刻字仍清晰可辨。盗贼疑是兵书，搬到外面一看不是，便扔下走了。有位叫萧叔常的人偶然发现后，就用船将环石载回，准备送交官府，以传天下。

因为当时兵荒马乱，萧叔常未能遂愿，且不久去世。临终前，萧叔常嘱咐家人用褚氏墓里的环石来覆盖自己的



棺材，并要后代守好他的墓。萧叔常的儿子萧渊，遵父遗嘱，并又请人制刻了一百本，借以流传后世。

时隔200多年后，即宋朝靖康初年（公元1126年），萧家破落贫困，这时已经是萧叔常的第12代了，萧家后人依然守墓甚勤。有人怀疑萧家前人是富贵厚葬，就掘墓察看，发现漆棺如新，刻石共有19块，其中一块是萧渊增写的序文。僧人义堪将石刻进行了整理，后来经刘继先刊印，此书才流传于世。

这就是传世的《褚氏遗书》，据称为南朝宋齐间褚澄的作品。那么，这本书可以说是唐以前一本篇幅短小、有论无方的医学论著了。关于褚澄的身世，除《南史》及《唐志》略有记载外，概不多见。而《褚氏遗书》则经肖渊初刻行世后，宋嘉泰元年（1201），甘泉丁介再刻印其书，流传遂渐广泛。

《褚氏遗书》为医论10篇，计2619字。清《四库全书提要》称：“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其论寡妇僧尼必有异乎妻妾之疗，《褚氏遗书》医论著作，旧题南齐·褚澄编。本书系唐朝人从褚氏椁中发现石刻整理而成。宋嘉泰年间刊行流传。”

全书共受形、本气、平脉、精血、津润、分体、余疾、审微、辨书、问子10篇。内容简短，多据《黄帝内经》理论加以阐述发挥。《褚氏遗书》体现了褚澄及当时卓越医家重视精血、津液的认识与学说。其中对血证及妇科病证治的见解，向为后世医家所推崇。斯书后来收入在《六醴斋医书》中。



《褚氏遗书》的作者褚澄(?—483年)，字彦道，南齐时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人。褚家世居高官，连姻宗室。褚澄的父亲褚湛之，是南齐尚书左仆射。据《南齐书》记载：“初，湛之尚始安公主，薨，纳侧室郭氏，生渊，后尚吴郡公主，生澄。”褚湛之死后，立褚渊为嫡子。褚渊官至齐太宰侍中录尚书。褚澄与宋文帝刘义隆之女庐江公主结婚，拜为驸马都尉。齐高帝建元(公元479—482年)中，出任吴郡(今江苏省苏州市)太守。因褚渊死后，澄用巨款赎回齐高帝萧道成赐给褚渊的白貂坐褥和其他物品为己用，永明元年(公元483年)御史中丞袁象参奏，而被免官禁锢，官降侍中。该年卒。后来，褚澄的女儿立为东昏皇后，于永元元年(公元499年)，东昏侯萧宝卷追封褚澄为紫金光禄大夫。

褚澄之前的五代，史上载褚裒、褚韵、褚爽、褚秀之、褚湛之、褚渊。褚裒任晋太傅，褚韵任秘书监，褚爽任紫金光禄大夫，褚秀之任大司马琅邪王，褚湛之任南齐左仆射。据史书记载，褚澄不仅善究医术。有人赞誉他“望色辨证，投剂如神，与卢扁、华佗比肩”。褚澄著有《褚氏遗书》一卷传世，另有《杂药方七录》二十卷(已佚)。

建元中，吴郡太守豫章王有病，其父齐高帝萧道成非常忧愁，企图用大赦天下的办法，来使儿子的病好转。结果是缘木求鱼，未能遂愿。后来听说褚澄师事扬淳，学有秘方，就召褚澄医治。褚澄药到病除，萧道成不胜欣喜，就提拔褚氏作了左民尚书。



据载，在褚澄任吴郡太守的时候，有个叫李念道的人，因为公事来见褚澄。褚澄一见李氏就说：“你有重疾”。李氏答道：“我一向有冷病，至今已经五年了，许多医生都治不好。”褚澄为李氏诊脉后说道：“你不是冷病，也不是热病，而是吃‘白淪鸡子’过多造成的。”褚澄让李氏用苏（俗称小蒜，见《本草纲目》）一升，煮服。李氏服药后就吐出一物如升，痰涎围裹，李道念的病从此痊愈。

《褚氏遗书·问子》和其他资料中还记载有这样一件事：建平王有很多漂亮的妃姬，但都不会生育男孩。建平王就向褚氏求教得子的方法，褚氏向他讲述了育子的道理和他不能得子的原因，并给他提出了生育男孩的方法。建平王按褚澄说的去做，果然不到两年，就有了六个男孩。

其例虽有离奇，但都有案可稽。可见，褚澄的医术是很高明的。当时有人评道：“彦道在当时，连姻宗室，贵富鲜丽，而能造诣如此，则超出尘表之姿，又可想见之也。”不全虚语。

二

《褚氏遗书》的真伪，由于其书出世离奇，后世不少学者曾有质疑。明代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谓：“此其妄谬，疑后人托名以欺人也。”清人从目录学角度加以考证，认为该书“宋嘉泰中始有刊版，云请泰中黄巢乱时，群盗发冢得之石刻，殆出依托”（《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继之，《四库提要》《河南通志》亦云：“疑宋时精医理者所著，而伪托澄以传。”

近代张心澂《伪书通考》和陈邦贤《中国医学人名



志》皆遵清说，另有贾得道的《中国医学史略》在讨论五运六气学说的发展史时，曾经指出：“《褚氏遗书》中曾谈到这种学说，但该书为后人所伪。”

从《南齐书》和《南史》等史料来看，褚氏确精医术，这是他撰述《褚氏遗书》基础。褚氏确有著述。这一点可以从与褚澄同时代的医药学家陶弘景（公元456—536年）的《本草经集注》中得到证实。陶弘景在赞扬历代名医医术精湛时曾对褚氏等人评价说：“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并明确指出：“凡此诸人，各有所撰。”陶弘景所述足以证明，在褚澄生前或身后已有医著行世，并且可以断定，褚氏医著早于公元536年以前陶弘景就亲眼目睹了。

自唐代王冰厘订《素问》，补入“七篇大论”后，始兴运气学说，后人有疑王冰以《阴阳大论》所补者，至今尚未定论。《阴阳大论》首见于东汉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序》中，当时已被仲景引用。即使是王冰以《阴阳大论》来妄补“七篇大论”，那么运气学说也早在褚氏之前已经存在了。至于当时鲜见医家引用，则当别论。在此以五运六气学说盛于宋而断定《褚氏遗书》为后人所伪，不能成立。

古代目录学专著往往对子部医家类著作重视不够，或因撰者闻见所限，遗者亦众，如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阴阳十一脉灸经》等10余种医书，皆不见诸历代目录学专著；亦有医著同时代目录学专著不见收载而其后见者，如隋代杨上善的《黄帝内经太素》，到了唐代还未见诸《隋书经籍志》，而至宋代的《唐书艺文志》方见著录。可见，古



代目录学专著虽然可以用来辨别旧槧、剖析源流，但也并非绝对尺度。所以那种因《褚氏遗书》首见于《宋史艺文志》而断定其为宋间伪书的观点，是不全面的。

上古时期，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记录文献曾受到材料的限制，而出现过“金石文”。后人立言为不朽计，亦有刻诸金石，藏诸土中者，屡见不鲜，如洛阳龙门的药方洞、陕西华山莲花峰的《固齿方》、广西南宁宣化厅的《疗病方书》、广西刘仙岩的《葬气汤方》、广西贵州馆驿的《集验方》、陕西耀县五台山的《千金宝要碑》等中医古籍，都是见之于石刻的。中国古代石刻种类繁多，古代艺术家和匠师们创造并运用了圆雕、浮雕、透雕减地平雕、线刻等各种技法，尤其是在商周起逐渐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陵寝制度以后，陵墓石刻就随着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的发展而成为其重要组成部分。陵墓石刻大致分为两类：地下和地上石刻。地下石刻为墓室内实用性和装饰性石刻，如汉代的画像石即作为墓室构件嵌置于墓门及四壁上面刻有内容丰富的各种图画，还有石棺、石槨等葬具，除了本身具有艺术性的造型外还刻有各种图案装饰。这些画像石及各种刻饰多采用减地平雕及线刻的手法，镌刻精美，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及装饰效果。地上石刻主要是陵园、墓葬前的仪卫性和纪念性石刻。仪卫性石刻是在陵墓前神道两侧按一定的规制置放的石人、石兽等，起着保卫及仪仗作用。纪念性石刻则是为了纪念某个事件而专门雕刻的，如唐太宗昭陵墓前雕刻的“昭陵六骏”等。这些石刻体量硕大，造型生动，威严肃穆。古代石刻除上述陵墓石刻和宗教石刻外，还有很多实用性石刻。如宫殿、门



阙、牌坊、桥梁、寺庙等各种建筑构件及一些实用性石刻，如石灯、石函、石镇、碑首、栓马桩等，这些石刻上也多有精美的雕刻。古代匠师们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将实用性和艺术性巧妙地结合起来，其中不乏石刻艺术中的珍品。

古文献《巴协》中记载有当时藏王赤德祖赞从尼泊尔请来工匠和雕刻师的资料。据说，位于药王山东面半山腰的查拉鲁甫石窟，就是为吐蕃时期松赞干布的茹雍妃子所建。文献记载“茹雍妃在查拉鲁甫雕刻大梵天等佛像，当时盐价已上涨了八十倍之多，工匠雕刻时每产生一升的岩粉，其报酬即是给盐一升，在岩壁上雕凿出石窟经堂等等，历时十三年完成。”这种支提式窟的形式曾流行于北魏和隋唐时期，唐代以后就不多见了。但在药王山，现在仍然可以实地看到的这种石窟风格，也可以印证此石窟的开凿时间和史料记载基本是比较吻合的。由此可见，通过对查拉鲁甫石窟造像的考察可以断定，药王山摩崖的开凿从吐蕃时期就已经开始了。也就是说早在吐蕃王朝的前期，药王山就已经开始了佛造像的雕刻工作。在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中也有这样一段记载与石刻有关的资料，大致内容是：“藏王亲眼看见那里有自然显现的六字真言，他当即沐浴净身虔诚祈祷。岩石之上也自然现出菩萨、度母、马头金刚等佛像。松赞干布即请来尼泊尔的一些有精巧的造像技能的工人，依照自然显现出的佛像身形、神采，而精细雕刻出清晰的佛菩萨像。”在以后千余年的历史演变中，随着西藏地方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佛教信仰的深化和普及，陆续有造像、刻字活动，不断有各种新的作品增刻在山上，大者数丈，小者不足方寸。



唐代初年，在天兴（今凤翔）三峙原发现了10个鼓形石，上面各刻着四言诗一首，共600多字，人们叫它“石鼓文”。石鼓文的发现引起了唐代文人的极大兴趣，很多人都进行了研究，杜甫、韩愈、韦应物等人作诗题咏。其拓片也流传于世，为历代所珍视。因为诗的内容主要写秦国国君的游猎活动，所以也称为“猎碣”。石鼓文是中国最早的石刻文字，书体为秦大篆，历代评价甚高。它结构和谐，隽美秀丽，被视为大篆经典之极品。其年代唐代人以为是周文王或周宣王时，宋人提出是秦始皇以前之物。经近代和现代学者考证，认定是秦国刻石，但仍有文公、穆公、襄公、献公之说。

而中国最早的石刻医学论著应当就是《褚氏遗书》了。始著录于《宋史·艺文志》。根据后唐清泰二年（公元935年）萧渊序所记载，《褚氏遗书》是在唐末黄巢起义时发现的石刻碑文。马金的《褚氏遗书·后序》曾认为，《褚氏遗书》得之石刻，“殆与汲冢之《周书》、昭陵之《义帖》、石室之《阴符经》、佛龕之《古文苑》事相类。”所以褚氏为立言计，当时付诸石刻，藏诸土中，是完全可能的。那种因为《褚氏遗书》得之石刻之曲折，而把它视为伪书的观点，有失臆断。持伪见说者，没有任何确凿证据，难以服人。

从《褚氏遗书》的历代传述者来看，第一次将石刻整理成书者是后唐萧渊，其为书作序的时间是清泰二年，即公元935年；事隔92年之后，北宋义堪做了第二次整理，其为书作序的时间是靖康二年，即公元1127年；越74年之后，南宋的丁介做了第三次整理，其为书作序的时间是嘉泰元



年，即公元1195年；距305年之后，明代秦悦民、马金和李暹相继又做了一番整理工作。从明以前这几位传述者来看，他们的相隔时间都很长，又都不是一个时期的人，而对《褚氏遗书》历世经过的叙述如出一辙，这种相继数百年的沿袭“伪造”，显然是不可能的。况且，这些人都是下了一番研究功夫的学者，他们都把《褚氏遗书》奉为不可多得的真品。《褚氏遗书·问子》记载了建平王按褚澄所讲的求子之道去做，“未再期，生六男”一事，南宋丁介的跋文对此作了考证，有云：“《问子》篇称建平王，当是澄之妻之侄景素，其生六子即延龄、延年辈。”核之事征，确有其事。可见《褚氏遗书》所述之事并非伪造。

再以明代胡应麟《四部正伪》提出的“审核伪书八法”来说，“核之《七略》以观其源”，因《褚氏遗书》晚于《七略》，故不能澄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可知《褚氏遗书》确为元·托克托等编撰的《宋史·艺文志》所第一次收录，但历代志书对古医籍的收录有失偏颇，故不能以此定为宋间伪书；“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可见与褚氏几乎是同时代人的陶弘景证明了当时褚氏已有医著行世；“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可见明季始有徐春甫疑其为伪书，继清之后皆承其说，然而宋明两季的其他名医如陈自明、齐仲甫、张景岳、王肯堂，皆谙《褚氏遗书》而未发异议，况且，持伪见者皆属怀疑而乏确凿证据。“核之文以观其体”，现代徐荣斋氏已定其为成书于唐之前，非伪书也，“核之事以观其事”，可见南宋丁介对《问子》篇所述之事的考证，确属其实，进而否定了伪见。“核之撰者以观其托”，可见历代刻本皆署名



褚澄撰，并无伪隙；“核之传者以观其人”，可见历代整理者间隔时间都很长，对成书过程的叙述一致无异。这些历史轨迹，虽有传奇色彩，但来龙去脉清晰，合于逻辑。情由细节详备，契于情理。所以，结论应当是，《褚氏遗书》是真品，而非伪书。

三

《褚氏遗书》的学术思想。《褚氏遗书》分受形、本气、平脉、津润、分体、精血、除疫、审微、辨书、问子等10篇。虽然全书仅有2200余字，但内容丰富，具有真知灼见，“发挥人身中造化之秘，明白要约，殆无余蕴”。

《四库提要》评论说：“其书于《灵枢》《素问》之理颇有发明”，在许多方面“发前人所未发”，其见地真灼，“尤千古之龟鉴”。在中国医学史上，本书最早提出了关于男女胚胎形成的理论。《受形》篇说：“男女之合，二情交和，阴血先至，阳精后冲，血开裹精，精入为骨，而男形成矣；阳精先入，阴血后参，精开裹血，血入居本，而女形成矣。”这种理论，虽然源于《易经》而见诸医籍者，然当首推此。褚氏还提出了由于“阴阳均至”形成“非男非女之身”的理论，这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是最早的，而且在世界医学史上，也可以说是最早的。

《褚氏遗书·津润》篇还说：“咳血……饮溲溺（即小便）则百不一死。”这是用小便治疗肺结核咯血的最早记载。现代动物药也肯定了小便有“治肺结核咯血”的作用。诸如辨证施治，提倡晚婚，对人类有遗传现象的认识，预防传染病的论述，以及提出不同于一般的寸、关、尺三部划分五脏的方法，都是十分精湛的，对后世医家产



生了很大的影响。由于《褚氏遗书》的学术价值，因此为历代医家所重视，如《备急千金要方》《女科百问》《伤寒九十论》《养身纂要》《妇人大全良方》《丹溪心法》《续医说》《证治准绳》《景岳全书》《万氏妇人科》《广嗣纪要》《慎柔五书》《折肱漫录》《友渔斋医话》《医宗金鉴》唐以后诸书都有引述。不仅如此，《褚氏遗书》在日本的影响也很大。日本延宝元年（公元1673年），《褚氏遗书》（明·胡文焕校本）已传到日本。当时，吉田四郎进行了翻刻，并收入《内阁文库图书》中。时隔6年，又重印收入《杏雨书屋图书》及《续中国医学书目》中，并且还有手抄本。《褚氏遗书》还受到了日本大朴学家、医学家们的重视，冈西为人的《宋以前医籍考》和丹波元胤的《中国医籍考》都作了收录。

《褚氏遗书》论述问题言简意赅，例如，《本气》篇说：“天地之气，周于一年；人身之气，周于一日。”并且用一日中不同时辰来说明阴阳之气的流行情况：“人身阳气以子中自左足而上，循左股、左手指、左臂，左脑，横过右脑、右肩、右臂手指、胁、足，则又入子中矣；阴气以午中自右手心通右臂、右肩，横过左肩、左臂、左胁、左足、外肾、右足、右胁，则入午中矣。”《灵枢·营卫生会篇》有依太阳运行周天度数把营卫之气分为昼夜各行阴阳二十五度的论述，而论阴阳之气的发生时间、部位和循行路线者，则首见于《褚氏遗书》。

《褚氏遗书》有许多新的创建。如《分体篇》说：“耳、目、口、鼻、阴尻，窍也；臂、股、指、趾，肢也；双乳、外肾，关也；齿发爪甲，余也；枝指旁趾，附



也。”其中“关”“附”等五体的解剖概念，是此书首先提出来的，其命名也富有深刻含义，并且从生理学，病理学方面作了论述：“附，有疾痛无生死；关，有生死疾痛无消长；有消长疾痛生死者，疣瘤而已。”这种观点至今仍不失其临床价值。又如《平脉》篇提出的非男非女之体的脉象可以变化，“感以妇人则男脉应脰，动以男子则女脉顺指。”这种认识是宋以前的医家从来未论及的。同篇，又强调医生要掌握正常人脉象的个体差异，“体修长者脉疏，形侏儒者脉蹙。肥人如沉而正，沉者愈沉；瘦人如浮而正，浮者愈浮。未烛斯理，曷愈众疾”。其所论从不同程度上补充了《黄帝内经》《脉经》等经典著作的不足之处，后世医家多有效法。

辨证施治，良工之道。《褚氏遗书》非常强调辨证施治的重要性，《除痰》《审微》两篇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例如，“病有微而杀人，势有重而易治”“疾有误凉而得冷证，有似是而实非，差之毫厘，损其寿命。”所以“除疾之道一要极其候证”“精微区别，天下之良工哉”。

《褚氏遗书》还提出了许多辨证的方法，如“询其嗜好，察致病之由来，观时人之所患”“相其老壮，酌其浅深”“穷其病之始终”等等，既有前人的经验总结，又有自己的独见之处。

在施治方面，《褚氏遗书》提出了一系列原则和方法。如“补羸女，先养血壮脾；补弱男，则壮脾节色”“外病疗内，上病救下，辨病脏之虚实，通病脏之母子”“热则先凉脏，冷则先温血”等等。在用药上，主张中病即止，不可孟浪，“当验之药，未验，切戒急投；大势既



去，余势不宜再药。”认为：“制剂独味为上，二味次之，多品为下。”力倡使用单味药。尤其是褚氏对传染病非常重视，指出：在诊察疾病时，要“观时人之所患”；在治疗时，要以预防为先，“时人多疟，宜防为疟，时人多疹，宜防作疹”。这些论述，后世医家多有赞论，至今对临床还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四

《褚氏遗书》在学术上，非常重要的价值是，首先论述父母的年龄、体质对子女的影响，这在遗传学上有相当非凡的意义。遗传学研究同人类本身密切相关。由于人类遗传学研究的开展，特别是应用体细胞遗传学和生化遗传学方法所取得的进展，对于遗传性疾病的种类和原因已经有很多了解；产前诊断和婴儿的遗传性疾病诊断已经逐渐推广；对于某些遗传性疾病的药物治疗也在研究中。人类遗传学研究也是优生学的基础。

父少母老，产女必羸；母壮父衰，生男必弱，古之良工必察乎此。受气偏瘁，与之补之，补羸女，先养血壮气；补弱男，则壮气节色。羸女宜及时而嫁，弱男宜待壮而婚，此疾外所务之本，不可不察也。以上都是一些有关遗传和优生的理论，有一定的科学性，而且十分重要。

《褚氏遗书》提出，过早地发生性交行为对后代不利。建平王妃姬等皆丽而无子，择良家女未笄者入御，又无子。问曰：“求男有道乎？”澄对之曰：“合男女必当期年，男虽十六而精通，必三十而娶。女虽十四而天癸至，必二十而嫁。皆欲阴阳气完实而交合，则交而孕，孕而育，育而为子，坚壮强寿。今未笄之女，天癸始至，已